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渝会所详考

熊 飞 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摘 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迁渝之后,初在公园路青年会 104 号办公,后租得临江门横街 33 号作为会所,因日机轰炸被毁,又租得张家花园 65 号为新会所。其“两翼”,一为南温泉南泉新村 24 号附 3 号,有会员宿舍数间;二是北碚办事处,初在北碚汽车站旁边的“止庐”,后迁蔡锷路 24 号林语堂住宅。文中的考证,既是对“文协”总会史迹的彰明,同时也是对其民族节概的阐扬。

关键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会所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4-0015-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402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假座汉口市商会,正式宣告成立^{[1]403}。随着战局的变化,7 月 26 日,“文协”举行第二次晚会,讨论总会迁渝问题。7 月 30 日,老舍、萧伯青、老向、何容携带总会印鉴,始行入川。8 月 12 日,老舍一行抵渝^{[1]407}。

“文协”总会迁渝之后,其会址的具体处所及有关变迁,长期以来,未见明晰的介绍。吴福辉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曾作《抗战期间“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一文,考证綦详,但仍有诸多未尽之处,现据“文协”在《新蜀报》所辟副刊《蜀道》[主编:姚蓬子(1940 年 1 月 1 日—1943 年 5 月 31 日)]的相关报道,略作补遗。

一、青年会、临江门三十三号、华裕农场

1938 年 9 月 12 日,“文协”总务部主任舒舍予和代副主任肖(应作“萧”,引者注)伯青在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的《报送会务状况报告书备案呈》中,说明“总会遵照第二次临时理事会决议,于八日(‘月’之误,引者注)中由汉移渝”^{[2]755}，“暂在本市(重庆市,引者注)公园路青年会 104 号办公”“俟觅矣固定会址即行呈报”^{[2]754}。所谓“青年会”,是指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两月之后,经会员蒋碧薇、郭有守等介绍,“文协”租得临江门横街 33 号的三层楼屋四间,作为总会会所,对外正式办公^{[3]100}。1939 年 9 月 20 日,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迁临江路横街五十八号^{[4]9}(即临江顺城街五十八号)办公,与“文协”会所相隔不远。因“文协”会所较为逼仄,故常借用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的

收稿日期:2020-04-12

作者简介:熊飞宇(1974—),男,四川南江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重庆抗战文化。

基金项目: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2018 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文学‘民国重庆’叙事研究”(2018PY29)。

场地开展活动,如1940年12月7日,“文协”即假此举办茶话会,欢迎茅盾、冰心、巴金、安娥、徐迟、马耳(即叶君健,时“受重大之聘,任英文系代理系主任职”,^{[5]4}引者注)、袁水拍等新近来渝会员^{[6]4}。

此间,“文协”会员部分仍留居青年会,另一个较为集中的住所是长江南岸重庆铜元局的华裕农场。农场为胡子昂开建,场部为一扁长的四合院。“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成员返渝后,多居于此。据吴福辉的考述,计有宋之的、王莘夫妇,罗烽、白朗夫妇,章泯、萧昆(萧三之妹)夫妇,葛一虹,沙汀等^{[3]100-101}。

1940年6月12日,日机轰炸重庆,向“文协”会址投一炸弹,“所幸炸弹不大,仅仅炸塌了第四层。文协的房子在三层楼,虽然天花板震塌了,墙角炸去了,四面都是垒垒的弹洞,一时床翻桌倒,泥走土飞,满地都是狼藉的书报,但尚未致命”^{[7]171}。下午六时,即“警报解除后三小时半”,蓬子便写成《文协是毁灭不了的》,记述其被炸状况及处理经过。

时住会作家蓬子、艾青和黑丁自防空洞回到“文协”之后,迅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由姚蓬子去陈家桥找老舍,商议“在短时期内再建立文协的新会所”,艾青和黑丁则指挥工友清理会所;同时决定在《蜀道》开辟“敌机滥炸文协”的专号。稍后,蓬子外出,路遇曾克,又决定在《抗战文艺》六月号出版特辑,并嘱其捎话给艾青、黑丁^{[8]4},于是在6月13日的《蜀道》第144期上,乃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启事》:“敌机昨日(12日)滥炸重庆市区,本会略有损失。但在会诸作家均无恙,各方寄来文稿亦损失甚少。兹由本会出版部决定在会报《抗战文艺》六月号出一敌机滥炸文协特辑,望本会会员于三日内寄文至邮箱二三五号为荷。此启。”次日再刊此则启事(其文字略有变化,如末句为“望本会会员于二日内寄文至本会邮箱为荷”)。6月17日,蓬子在《蜀道》第147期,又致信罗荪,询问:“文协会报轰炸特辑已收到文稿若干篇?请寄弟编发为荷。”

对于此次轰炸的后果,6月19日,《蜀道》第149期的“文艺简讯”曾有所公布:“文协应征长篇小说,均于文协被炸时灰尘中抢[救]出来,只字未失”,“老舍,何容在青年会宿舍已池鱼遭殃,但损失不多”;艾青则在轰炸后去了北碚,“暂住育才学校内”。顺带提及的是,此一时期老舍的居所,进城住在青年会,乡居则在陈家桥。其在陈家桥居住的时间甚长,于其文字,多处可见,而学界则较少注意到此,故笔者拟再以专文考证。同样也是因为敌机轰炸,“郭沫若某花园住处”被毁,“即迁居赖家桥乡间”^{[9]4}。

临江门的“文协”会所,被炸毁“多一半房屋”,“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晚会”^{[10]224}。7月12日,《蜀道》第170期的“文艺简讯”亦云:“临江门文协会所虽受敌机破坏,但作家们仍爱这自己的‘□□’,纵风雨不蔽,而作家自乡间进城时仍□住会,最近梅林,以群等均寄宿会内,一盏青灯,相对倍觉亲密。”

不过,“到六月十九日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区”^{[9]224},而姚蓬子也不得不临时撤退,故在《蜀道》第147期致信以群,告知其有关信件“可寄北碚新村八十二号教育部民族读物组王向辰兄收转”^{[11]4}。至10月2日,才在《蜀道》第244期发布《启事》,宣告:“以后《蜀道》稿件,及姚蓬子个人私信,请勿再由北碚王向辰先生收转,直寄白象街本报(《新蜀报》,引者注)为荷。”

二、南温泉宿舍

1940年春初,“文协”未雨绸缪,曾在南温泉备下房屋数间。“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南温泉便成“文协的第二个家”^{[10]224}。

“文协”的南温泉宿舍,其门牌号具体为何,这在萧军日记中留有记载。1940年4月17日,萧军从罗烽家移往南温泉,住入“南泉新村24号附三号‘文协’的房子里”^{[12]119}。4月19日晨,萧军在致胡风

的信中,亦曾留下通讯地址:“南温泉,南泉新村 24 号附三号”^{[12]119}。不过,此处所谓“南泉新村 24 号附三号”是指“文协”在南温泉的所有会员宿舍,还是单指萧军所住房间,尚无从分辨。

对于南温泉的“文协”草舍,证之当年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后来研究者的描述,可以见出其大致情形。

当年沙汀去南温泉时,“先找到杨骚、欧阳山他们。原来文抗的疏散房子,就在他们住所的河对岸,只是地势要低得多,房子则是青瓦砖木结构。”“住会的秘书梅林同志夫妇而外,仿佛只有臧云远同志长期住在那里,雇了一位娘姨做饭,费用大家分担。房舍宽敞,用具绰绰有余”。沙汀去后,“就在一间客房里住下”^{[13]55}。吴福辉的《沙汀传》则是这般描述:“南温泉较近,过江在海棠溪乘公开汽车可直达。走完南温泉的正街,顺坡进入后面的桃子沟,在河沟北岸搭起一列租金低廉的茅舍,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都住在这里,简直就是‘左联’小说散文组的原班人马。后来‘文协’很有先见之明的在这里预备下几间房子,等 4 月下旬第二次轰炸来的时候,正好派上用场。”^{[14]244}“重庆‘五四大轰炸’后,沙汀与许多人疏散到南温泉桃子沟。欧阳山、杨骚住所的河对岸,是文协具有先见之明租下的房子。梅林、臧云远、陈学昭住在这里,很宽敞。沙汀也分到了一间客房。对面隔河住着章回小说家张恨水。”^{[15]74}

再看臧云远的回忆:当时“全国文协”“在重庆南温泉和北温泉(北碚)都租了房子,供作家去写作。老舍住在北碚,梅林住在南温泉,我有个时候也住在南温泉。同住的有萧军一家,欧阳山和草明,舒群单人住在我隔壁,我一人住间大房子。后来沙汀到了山城,我与他同屋。梅林天天办置可口的饭菜”^{[16]890-891}。但“可口的饭菜”很快就变得难以为继。1943 年 8 月 2 日,梅林在日记中感叹:“上个月我们每个人伙食费平均五百元,水炭佣人工资还是‘文协’津贴的。贵到这种程度,我们负担不起了。我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只靠稿费维持生活,所谓职业作家。现在文艺杂志极少,书籍出版不易,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写作成绩亦极有限,同时稿费始终赶不上狂涨的物价。我们每月最低的生活费约需千余元,这还不能购置日用必需品。”^{[17]191}

对此一时期的杨骚,沙汀在《活在记忆中的人们》(写于 1979 年春)曾回忆说:“1940 年我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同欧阳山、草明的关系仍然很好,一道对门对户住在南温泉一条临时拼凑的小弄里。是所谓疏散房子,非常简陋;它只有一个好处:空气清新,躺在床上都可以欣赏自然景色。我住在‘文抗’的疏散房子里,同他们隔河相望。晚饭后一般是到河边坐茶馆,如果谁得稿费,就买点当时相当时髦的所谓‘冷气大曲’,一面闲谈,一面呷酒。”^{[18]441}青禾的《杨骚传》则有如下描述:“从重庆过江,往南走十几里,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叫南温泉。”“这里有一条河,叫花溪河。两岸山峦起伏,林涛如海,河上烟水迷离,如诗如画。河的北岸,有一溜租金低廉的茅舍。竹篾为墙,上敷泥土。”除杨骚外,此处还住有“欧阳山、草明、肖军和白薇”。“河的对岸,是‘文协’租用的房子,梅林、臧云远、陈学昭、沙汀住在那里。与‘文协’的房子相邻,是章回小说家张恨水的院子。”“从杨骚的住处,过一座小桥,绕过张恨水的院子,便到了冠生园”,“这里有川东银行、福音堂、川东医院、陪都工商学院……”,“温泉疗养院里也住满了客人”^{[19]236}。可能正因为疗养院之故,萧军才在日记中说:“第一次我对于此地没有好感,这是一个荒瘠的庸俗的山谷,住在这里的全是一些寄生阶级,每天被庸俗地繁荣着。”^{[12]119}

再看草明的回忆:“重庆空袭频繁”,而“我那时身孕已有七、八个月,跑警报、钻岩洞已非孕妇适宜,为此欧阳山到十八公里外的南温泉找了一套简易房子。那时有聪明的商人花不多的钱,用竹片,和上泥土、石灰,盖了许多房子出租,发了财。一套两间,租钱也不贵,我们就租了一套。”^{[20]102}白舒荣的草明小传则说:“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黄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汨汨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21]124-125}

由于年代久远,上述回忆或有不确定,而其中互相矛盾、前后抵牾之处,也不止一二。但通过综合比较,似可得到以下信息:南温泉的作家住房有两类,一是竹屋,系商家投资所建,用于租住;二是“文协”

购置的宿舍,属于“青瓦砖木结构”(沙汀此说甚可疑)。而负责南泉“文协”日常会务的,则是梅林。

此外,寓居南泉的“文协”会员,除上述作家,1941年初还曾传出“冰心近将迁养花溪新居”^[22]⁴的消息。

三、北碚办事处:止庐与林语堂宅

“文协”新会所的再建,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1940年6月21日,“文协理事舒舍予,王向辰,姚蓬子等”,“在北温泉邀请居留北碚诸作家开座谈会,商讨在北碚建立文协据点,并团结作家间之友谊”^[23]⁴。同时“邀请居留北碚文协会员在北温泉举行[聚]餐,并讨论以后如何在北碚开展文协工作,计到田汉,梁宗岱,方令孺,陈子展,马宗融,艾青,以群,靳以,赵清阁,封禾子,向林冰,王冰洋,海戈,田鲁,沉樱,贺绿汀,舒尉青(多作‘舒蔚青’,引者注)等二十余人,情形至为热烈”^[24]⁴。因为“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设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的关系不至中断”,但在碚的会员比南温泉的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且“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故“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10]²²⁴。

此次商讨的结果,曾在6月23日,通过《蜀道》第153期的“文艺简讯”发布:“文协被毁后,蓬子已于本月十四日赴陈家桥与老舍商善后办法,决定最短期内于重庆近郊再建文协会所,经向在渝作家们征求意见,多以北碚为宜,兹已托老向口觅房屋,同时在重庆成立一办事处,以便随时与各文化团体取得联络。”

“文协”北碚办事处会所不久便告落实。8月18日,《蜀道》第204期的“文艺简讯”宣告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办事处会所业经租定,地点在北碚汽车站旁边,房名‘止庐’,目前正在收拾,不久即可正式迁入,文协会员有愿在北碚居住者,可向该办事处接洽。”彼时的“北碚汽车站”,在今之“五路口处”^[25]⁷⁰。

“止庐”很快迎来第一批入住者。8月29日,《蜀道》第214期的“文艺简讯”云:“北碚文协办事处租定后,最近已将房子打扫干净,光未然,高长虹等均将搬入办事处居住。”同时,相关工作也在积极展开。9月16日,《蜀道》第230期的“文艺简讯”即有报道:“北碚文协办事处日前曾开一座谈会,老舍由陈家桥赶来参加。并决定开办一文艺讲习班,由胡风负责筹备。”

“林语堂离国前,曾致函文协,愿将其所购北碚私宅假文协作北碚会所”^[26]⁴。“文协”接受林语堂的捐赠一事,老舍在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的信中曾有详细介绍。

9月2日下午^[27]³²⁶,老舍在“蔡锷路廿四号”林宅,主持召开“文协”的临时会议,到会者有陈子展、马宗融、初大告、胡风、向林冰、王泽民、一文(即田一文,引者注)、田禽、光未然、陈学昭、赵清阁、老向、王洁之、高长虹、以群等。会议商讨的第一个事项就是“会所问题”:

决议接受林语堂先生的善意。林先生奉命出国,临行时交给老向一封信,嘱于九月间再转交文协,因他奉命到国外工作,不愿事前声张也。原函现已由老向交来,当众朗读:

“迺启者鄙人此次回国不料又因公匆匆去国未得与诸君细谈衷曲为憾惟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战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抒(应作‘纾’,引者注)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兹愿以北碚蔡锷路二十四号本宅捐出在抗战期间作为贵会会址并请王向辰先生夫妇常[用]居住代为看管除王先生夫妇应住二间房间及需用家俱外除尽公开为会中器物由理事会点查处置聊表愚忱尚希哂纳并祝努力,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入海之时也此致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八月十七日林语堂敬上(盖章)”

按信中的意思,房子是让给文协总会的;总会离不开重庆市内,那么就正好把此房作为总会在北碚的办公处,与[在]南泉的据点性质相同。房共五间,一客厅,四卧室;卧室都很小,仅

容一几[一]榻;客厅可容十数人,颇可作随时开会之用。当即推定以群,光未然管理内部的一切事情,萧伯青担任买置器物,并记账。

同时,一虹来信说城中某处有房五间,可否租下?即推定以群写快信,赶快租定。假若能成,则在渝,在碚,在南泉都有了寄宿[与]办公的地方,而北碚的房子是无须出租钱的^{[28]4}。

按林语堂是在1940年5月23日晨九时许,由香港飞抵重庆^{[29]3}。“在渝稍留数日后,始去北碚”^{[30]8}，“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与艾青^{[10]224}（按：应即上述6月21日的座谈与聚餐）。居碚期间，为避空袭，曾在7月6日^{[31]102}搬至缙云山的西华寺^{[31]105}，故8月7日，《蜀道》第194期的“文艺简讯”云：“林语堂近在缙云山闭[户]著作，因返国时，曾[向]美国某书局有约，允于返[国]后若干月内撰著新书一册在英国出版。”“其北碚新村住宅，七月三十一日敌机轰炸北碚时稍受损坏，损失不甚惨重。”8月16日，林语堂一家在北碚度过最后一夜^{[31]151}，于8月20日离开重庆^{[31]180}，重返美国。

至9月21日，《蜀道》第235期的“文艺简讯”透露：“文协”“北碚办事处所租房子已退租，迁入蔡锷路林宅办公”。由此，北碚与南泉便成为“文协的两翼”^{[10]224}。

关于“文协”北碚办事处，《北碚文化艺术志》有词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云：

1940年6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总会被炸，迁来北碚，租赁名为“上庐”的房屋一幢，建立北碚办公处，不久迁入林语堂捐赠的北碚蔡锷路24号住宅，公推以群，光未然管理内务。因重庆另外租到了房屋，总会仍设在重庆。但总会的活动，大部份仍在北碚，以后人们统称北碚办公处为北碚分会。总会干事萧伯青长期住此，负责日常工作。1943年秋，老舍又定居于此^{[32]9}。

其中的“上庐”，当为“止庐”之误。而所谓“文协北碚分会”，段从学认为是“一个未对有关史料加以澄清和考辨而引出的错误”^{[33]47}。

林宅作为“文协”的北碚会所之后，曾有“许多文人”往来居停，最后则由“两家人分住”“东面的一半”为老向一家，“西面的一半”为老舍一家^{[34]38}。至于老舍何时定居北碚，尚难明确。检《老舍年谱》，1943年寒假，老舍“在北碚路遇故友桑子中，相约第二天到家中来吃饺子”^{[27]395}。据桑子中回忆，当时老舍“住在离北碚市区不远的蔡锷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宿舍一所楼上，室内布置得简单朴素，整齐清洁，案头上放着日用必需的文具，秩序井然”^{[27]396}。是年“6月初”，老舍再到北碚，和赵清阁合写剧本《桃李春风》^{[27]403}。同年11月17日，“夫人胡絮青携子女抵达北碚，定居在蔡锷路24号（现为天生新村63号副16号），分别达六年之久的一家人得以团聚”^{[27]407}。1946年1月中旬，老舍“从北碚到渝，作出国准备”^{[27]454}。2月15日，“乘飞机抵达上海”^{[27]460}。至1950年4月13日，胡絮青及其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方从北碚返抵北京^{[27]521}。2000年9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北碚区天生街道天生新村65号”作为“重庆老舍旧居”，纳入第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共148处）予以公布。《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曾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暨重庆老舍旧居”为目进行介绍，但信息多误^{[35]233}。《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亦曾配图说明：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天生新村63号。原是1940年5月林语堂所购住宅，他离开北碚时将此房捐赠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0年春，老舍到重庆主持文协工作，1943至1946年在此居住，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话剧《桃李春风》《王老虎》《张自忠》、回忆录《八方风雨》以及散文、杂文、诗歌、曲艺等数百篇200多万字的作品。2010年11月24日，该宅正式挂牌为“四世同堂纪念馆”^{[36]封底}。

不过，此段文字可商榷处同样甚多，如所谓“1940年春，老舍到重庆主持文协工作”，即是显而易见的时间错误。

四、张家花园六十五号

鉴于“文协”“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故“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10]224}。上引文提到葛一虹信里所说的“城中某处”,老舍在文协成立三周年时的《总务部报告》中,有更详尽的说明:“恰好一虹与之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10]224}9月18日,《蜀道》第232期的“文艺简讯”宣布:“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总会已租张家花园六十五号为新会址。”

10月8日,《蜀道》第250期发表《通信》一则,由蓬子借答“启芳先生”之问,向社会广泛说明:“文协会所本在临江门三十三号,近租张家花园六十五号为[新]会所,临江门旧址或可改为宿舍。此外在南温泉租有会员宿舍,北碚设有办事处,亦可住宿会员。”“文协”总会会所的布局与重建,至此便告基本完成。而为了加强三地的联系与沟通,老舍也不得不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以推进工作,如前述北碚的“文协”会议召开之后,老舍便通过《蜀道》,发表“致南泉文协诸友信”,告知决议的有关内容,藉以互通声气。10月27日晚,“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诗歌晚会^{[37]3}之后,老舍即去南温泉,看望王平陵、戈宝权、欧阳山、草明、沙汀等^{[38]388},“由南温泉返北碚时”,又在10月31日,假一清真食堂,“与北碚文协同人”聚餐,“报告重庆总会近状,及以后各部工作计划”^{[39]4}。

新会所自租定之后,便时有“文协”会员回归。10月4日,《蜀道》第246期的“文艺简讯”云:“宋之的已自江北乡间迁渝,住于张家花园全国文艺新会所中。”10月5日,《蜀道》第247期的“文艺简讯”又云:“以群近□北碚来,住张家花园文协新会所。”

会所不久即有过一次修缮。12月10日,梅林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开始修葺会所,必须有一个办公室,一个会客室,一个传达室,工作才能展开;否则,就像目前办公、会客、卧室,全在一间房子里,是无法工作的,而且会使人发疯的。”^{[40]170}至12月16日,“文协的会所修葺完毕,朋友们各各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以群说:这以后好写文章了。”“有了会客室,有了工友住的传达室,而我也有了一间房子办公和作卧室。”^{[40]172}

张家花园65号作为“文协”会所运行至1946年^{[3]102},其间一直有作家接续入住。抗战胜利之后,艾芜从南温泉乡下白鹤林搬入城内,居孤儿院13号。1988年8月4日,艾芜对孤儿院及其周边环境,包括张家花园65号,有过这般回忆:“孤儿院这个区域,是在张家花园斜坡通道的底脚,三面是低矮的小坡,点缀有几家简陋的草屋。”“坡下是小块的平整地面,修有一列草屋,中有四五间屋子,可以住人。这就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利用西南联大学生为湘桂逃难的文化人募捐救济的钱买的一列草屋,起先由邵荃麟一家和聂绀弩等居住”,“由三面小坡包围的小平地,伸展出去,是一些田野菜地和小的臭水沟。有两三家农家草屋,点缀其间”^{[41]117}。8月5日,艾芜又继续追忆说:“由孤儿院或张家花园65号,爬坡上到观音岩,即上了大马路。重庆市闹热的街市,就在观音岩那一节。”^{[41]118}

五、文艺新村

《蜀道》1940年的“文艺简讯”中,还有一条信息值得重视,即在轰炸期间,文艺奖助金委员会也曾准备“建筑一文艺新村招待作家”,而“新村地点或将选大田湾一带”^{[42]4}。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与中央各有关机关”共同组织,成立于1940年4月24日,聘张道藩、郭沫若、舒舍予、程沧波、王芸生、林风眠、王平陵、华林、胡风、姚蓬子、李抱忱十一人为委员,吴云峰任秘书,办公地点初设九道门社会部^{[43]2}。后又聘段公爽为干事,“经常驻会办公”^{[44]4}。从中可以见出,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基本上都是“文协”成员。

“文艺新村”的筹建,主要是由林风眠、华林、阳翰笙三人负责“草拟计画,送会核议”^[45]⁴。10月6日,《蜀道》第248期“文艺简讯”又云:“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拟建之文艺村,闻[赈]济委员会愿拨款十万元,以襄此举。”11月18日,《蜀道》第286期“文艺简讯”报道说:“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所筹设之文艺新村,径(‘经’之误,引者注)华林,金满成等奔走结果,现已于两路口某处觅妥地址,闻今日即可签订租约。”至于其后续情况,尚待进一步考察。

由上可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迁渝之后,初在公园路青年会104号办公,后租得临江门横街33号作为会所,因日机轰炸遇毁,又租得张家花园65号为新会所。其“两翼”,一为南温泉南泉新村24号附3号,有会员宿舍数间;二是北碚办事处,初在北碚汽车站旁边的“止庐”,后迁蔡锷路24号林语堂住宅。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当时全国的文艺界,无论“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有何种不同,均在“抗敌”的共同目标之下,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实现了空前的团结^[46]¹。由于日军“炮火和轰炸的环攻”^[46]¹,迫使“文协”自汉口迁往重庆,又从重庆城区分散至南泉与北碚办公。在此一过程中,无论是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的慷慨捐赠,还是“文艺新村”的大力筹建,都体现出文艺界同社会各界一道共御外侮、共克时艰的决心和信念;特别是“文协”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境况之下奋勇自救、积极作为,充分展现出文艺家作为“民族的心灵,民族的眼和民族的呼声”^[46]¹的使命与担当。同时也因为战时的动乱岁月及其后的动荡时局,“文协”的档案资料未能妥善保存,致使后来的研究者缺乏充足的文献依凭。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对其在渝会所的考证,既为彰明“文协”总会的史迹,兼为阐扬“文协”的民族节概。

[参 考 文 献]

- [1] 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 [2] 袁佳红,王志昆,曾妍.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档案文献[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 吴福辉. 抗战期间“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J].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1).
- [4] 本会迁移新址办公[J]. 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会刊,1939(1).
- [5]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11-04.
- [6]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12-05.
- [7] 出版部. 关于会报及其他[J]. 抗战文艺,1940,6(3).
- [8] 蓬子. 文协是毁灭不了的[N]. 新蜀报,1940-06-13.
- [9]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7-13.
- [10] 总务部. 二年来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J]. 抗战文艺,1941(7).
- [11] 蓬子. 通信[N]. 新蜀报,1940-06-17.
- [12] 萧军. 萧军日记(1940年4月)[J]. 萧耘,王建中,萧玉. 整理. 现代中文学刊,2011(5).
- [13] 沙汀. 睢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14] 吴福辉. 沙汀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 [15] 吴福辉. 沙汀画传[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 [16] 臧云远. 你见过鲁迅吗?[M]//姜德明,主编. 七月寒雪·随笔卷:5.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 [17] 梅林. 梅林的抗战文坛日记(下)[J]. 段从学,辑注. 新文学史料,2018(3).
- [18] 沙汀. 沙汀文集:第十卷·回忆录[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 [19] 青禾. 杨骚传[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 [20] 草明. 世纪风云中跋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21] 白舒荣. 草明[G]//余仁凯,编. 草明葛琴研究资料.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 [22]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1-01-17.

- [23]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6-26.
- [24]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6-27.
- [25] 李莹华. 一代文章千古事[G]//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编. 老舍《四世同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6]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9-21.
- [27] 张桂兴. 老舍年谱[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28] 老舍. 致南泉文协诸友信(下)[N]. 新蜀报,1940-09-25.
- [29] 林语堂昨抵行都[N]. 新蜀报,1940-05-24.
- [30] 林语堂访问记[N]. 大美周报,1940-06-09.
- [31] 林如斯,林无双,林妹妹. 战时重庆风光[M]. 林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 [32] 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文化史志编写组. 北碚文化艺术志[G]. 重庆: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文化史志办公室,1991.
- [33] 段从学. “文协北碚分会说”考辨[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 [34] 舒乙. 家在语堂先生院中[J]. 北京政协,1996(8).
- [35] 李波. 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 [36] 乔丽华.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天生新村 63 号[J]. 现代中文学刊,2017(1).
- [37] 诗歌晚会:文协会昨晚举行[N]. 新蜀报,1940-10-28.
- [38] 李莹华. 老舍在北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重庆抗战纪事·续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1.
- [39]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11-06.
- [40] 梅林. 梅林的抗战文坛日记(上)[J]. 段从学,辑注. 新文学史料,2018(2).
- [41] 艾芜. 病中随想录[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 [42]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9-19.
- [43] 文艺奖助金管理会成立[N]. 新华日报,1940-04-25.
- [44]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10-14.
- [45] 文艺简讯[N]. 新蜀报,1940-09-20.
- [46]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N]. 新华日报,1938-03-27.

On the Clubhouse of the Nationwide Anti-Japanese Association of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ongqing

Xiong Feiyu

(Research Center of Sino-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ongqi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fter moving to Chongqing,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nationwide Anti-Japanese association of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was first located in the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ungking at No. 104, Park Road, then rented the No. 33 in Hengjie Street of Linjiang Gate as its clubhouse.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Japanese bombing, it had to rent the No. 65 of Zhangjia's Garden as its new clubhouse. It had "two wings", one was No. 24-3, Nanquan New Village with some thatched cottages as its member quarters in South Hot Spring; the other was its branch agent in Beibei which was located in "Zhi Lu" next to Beibei bus station for a short time, then moved to Lin Yutang's residence at No. 24, Cai E Road. The textual research is not only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its clubhouse, but also an exposition of its national spirit.

Keywords: nationwide Anti-Japanese association of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ongqing; clubhouse

[责任编辑:左福生]